

论疑古派与中国现代学术

张京华,彭敏^①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 研究古代史都会涉及古史辨的问题。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我们提倡怀疑精神但不是以怀疑为目的怀疑一切。疑古派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但学术影响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疑古派; 古史辨派; 中国现代学术;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77-02

一 疑古派与古史辨

我原来研究古代史,后来转到民国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古代史的人无论读什么都要涉及到古史辨这个问题。比如说学历史,读《尚书》,就有疑问:这东西是真的吗?这可靠吗?这作者是谁?读《左传》、读《国语》也是这样,甚至于读《史记》也如此。读诸子的话,那更是这样,《老》、《庄》、《管》、《晏》,后面像《吕览》、《淮南子》,一直都是有疑问的。对文学要是感兴趣,也会问,《诗经》是不是可靠,甚至于《楚辞》是不是可靠,甚至于往后边李陵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这些可靠不可靠,甚至于对《木兰辞》都有怀疑。所以说读古代的东西,特别是上古秦汉的东西,一拿起来就存在这个问题,跳不过这个古史辨,它在哪儿都能拦你一道,这个问题就躲不过去。甚至于研究科技史,那就要研究《黄帝内经》,古代历法、天文。研究文献学就不用说了,甚至于做田野考古,还是涉及到古史辨的很多问题。

大陆现在要写文章,篇幅都限制得挺死,一般七八千,有时可以万把字,多的一万五,再多它就不干了。港台的文章一万五,再多两万,它也不干了。研究一个问题,上古史每个问题都比较复杂,先需要一定篇幅来对这个文献、作者的考证叙述和评价,即文章一大部分先做文献批评,还得有一个人的保留看法。然后才做后边的正式研究。每次写文章就觉得篇幅上很矛盾,就感觉到古史辨超不过去。所以古史辨是一个基础问题,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历史专业的问题,整个古典学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研究古史辨这个题目,有基础性,影响大,别人都会关注。就是因为影响大,所以很多地方的人轻易不会动手去碰它,像北京、上海他们都了解这个问题,但是大家轻易不下笔,题目太大反而北京、上海不大动它。实际上,如果在地方,其它方面的研究基础较薄弱反而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应

该更容易有影响,出成果。

我们申报过一个古史辨方面的国家级课题,在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资料当时也不太好找。把搜集到的前期资料统一体例,校对以后,出了一本资料集,题目叫《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开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发言录音,包括会后的约稿,整理成一个论文集,题目叫《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两本书均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后来的结项成果,题目叫《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也出版了。

课题组成员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争议,我不能接受某些学者要给疑古派、顾颉刚三七开的说法。我对疑古派基本上是否定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说要否定他,而是研究了以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也有人说疑古派研究他们的结论几乎都不对,但是方法还是正确的。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出现,湖南马王堆、山东临沂帛书竹简接连不断,有很多文献直接出土,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很多影响是突破性的。对《孙子兵法》,顾先生在1958年做了一个差不多最后的结论,到1972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按语,始终认为《孙子兵法》不可靠,孙武这个人也没有,这是《史记》、司马迁在写小说。但是就在他做这个按语的时候,其实山东临沂的竹简已经出土,但没有公布,1974年发掘简报就公布出来了,一个墓既有《孙子兵法》又有《孙臆兵法》,孙武跟孙臆完全是两回事,书也是两回事。这种铁证后来就越来越多,所以那个时候就听到有这个议论,结论几乎不对,但方法还基本是对的。我对这种观点也不太认同。一种方法基本都是正确的但它导致的结论几乎是错误的,或者说导致结论错误的方法却是正确的方法,这不能不让人思考。

治学应该是开放性的,是没有成见的,都要有一种怀疑

〔收稿日期〕 2010-10-16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男,北京市人,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

①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精神。怀疑精神在现代讲究,在国外讲究,在中国古代也讲究。但是怀疑和怀疑精神是两回事,而疑古派不是提倡怀疑精神的一个派,它就是怀疑古代,把古代的文化做一个怀疑性的结论,它是这样一个怀疑主义的、怀疑性的一个学派,它不是讲究一个方法上的怀疑。怀疑精神是要的,要勇于怀疑、敢于怀疑、善于怀疑,但是疑古派以怀疑为结论这样一种导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要区分怀疑与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每个人都要具备,甚至小学生都应该有,但是疑古派的这个疑古结论,它是要“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那这就不是一种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其实是先怀疑然后再求真,最后结果是求真,怀疑并不是目的,怀疑的结果是最后揭示真相。

搞研究应特别强调方法。疑古派是专门考辨古书古史的,考辨它们的真伪,我们研究疑古派也就是对考辨作考辨,对这个考辨学派做考评,怀疑古代、考辨古代的时候,依据、逻辑性很仔细,对考辨作考辨也就不得不仔细。我们认为疑古派的研究对古人有误解,那我们对疑古派的研究就不能让疑古派说我们对他们有误解。我对古史辨派、对顾颉刚先生的主要代表著作都有“逐节的细致分析”,我就是怕我们说顾先生误解了古人,顾先生又说我们误解了他。

学术界对疑古派的研究出版的著作、论文集的总量其实不少,但大部分是纪念性的文章。纪念文章是需要的,也是应该的,但这样的文章会大量地引用顾先生本人的话。顾先生的疑古派是怎么样呢,他就写顾先生自己的话,顾先生说疑古派想要干什么,那他们就说疑古派干了什么,经常就以被研究者自己的陈述来判断古史辨。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有大量的文章会对顾先生作评价,其实大概还是顾颉刚自己的评价比较多。研究顾先生用他自己的陈述可以不可以呢?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经过分析才可以。五四以后史学有一种认识,以当事人的记录为一级文献,而不相信史书的裁断,这个观念是受西方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古代史官的制度非常严格,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五四以后当事人的许多书信、日记、自传都不好确信,跟史官的著作无法相比。在中国,当事人在陈述、自我评价还是不作为一级文献为好。

二 疑古学派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

还有一个趋向也很明显,就是强调顾先生这个疑古学派的影响。疑古学派的影响顾先生自己说了就好像给学术界扔了一个原子弹。原子弹其实只扔过一回,扔一回就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派也没错,因为它改变了学科的很多格局,它的影响非常大,这个也是事实。那我想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个学派的评价、对一些学者的评价能不能用他的影响大小来做评价标准?影响是肯定很大,但是不是影响大价值就高?他的正面的积极作用是不是很多?影响大就说他很好,这个学派就很对、很有贡献吗?影响并不等于贡献。这个世界上影响大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文革影响大,焚书坑儒影响大,可是你不能说它有太大的贡献。特别是从史家、史官的角度来考虑,我个人是觉得尤其不能用影响来说明事情本身。影响大的有时候刚好不能认同它,不等于有大贡献。

就社会层面来讲,人们会跟着影响大的潮流走,谁影响大就跟着谁走。这是一般社会层面,而这个史家、史官呢,刚好应该相反,就是你越影响大我就越批评你,因为没有人能够批评你。只有史家、史官能批评社会,批评政治,史家、史官如果再跟着影响走,那么史家、史官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史家、史官、史书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它能够在大家跟随着影响大的这个潮流走,特别是跟随着政治家、思想家走的时候,史官能提出一个清醒的思考。清醒的独立的思考,这是史家、史官的一个真精神。所以说如果要顺着社会潮流,古史辨影响很大,大家就对它评价很高、赞颂很高的话,那史学家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就是史学家看起来研究的是古代的东西,一说就是挖人家的骨头,挖人家的祖坟,一说就是上古史,远得不得了,但其实史家、史官的目标刚好是针对现代、当代,甚至是针对未来的。史学这个学科,其实刚好是最针对当代,能够针砭当代,甚至于能够对未来提出一些有意义的规划的学科,这样一个学科刚好是能够比较成功地预见未来的。因为你 not 读历史,可能很难预见未来;读历史呢其实刚好不是为了要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古人、古代去研究历史。对象肯定是古代的历史,而且方法肯定是尽量求真,不会在里面去制造一些虚伪的东西,不会去给小姑娘做穿衣打扮,不会影射,那个是不对的,但它所有的研究其实都是针对当代和未来的,这才叫历史学。所以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人对历史有误解,说历史就是研究古董的,没有用,其实历史比很多学科都有用。

我不同意影响大就是有贡献这样一种说法,史家、史官的精神刚好相反,刚好是越影响大越批评你,越制衡你,史家、史官是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为的是将来。这个就是史官制度,是古代一个很好的传统,五四以后丢掉了。其实我不留恋古代的历史,我也不留恋对顾先生的评价,我重在看顾先生这一派导致了后来的一种怎样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一直发展到了我们眼前、脚下,今后呢它又应该怎么走,会怎么走?可以就叫作“现代学术走向”。